知识是权力的根本因素之一。知识造就权力。

大众文化的目的，至少有一条就是刻意创造某种形象或幻觉填补大众的世界图景，无论政治、艺术、某种流行的观念或思潮，都是如此。这无关具体人的智力、文化、思辨性或其他因素的水平，不是因为智慧不够无法突破幻觉，而仅仅是因为没有人拥有足够的精力扫清世界图景中的每一幅幻觉，也不可能期待扫清这些幻觉后生活在某种更为本真的世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含义就是生活在现代社会所构建的全部幻觉之中。

在此，知识是一种反思性和构建性的力量。当珠三角的商品制造者看着十几块成本的服装从自家仓库流出的时候，他就很难再形成关于服装奢侈品的幻觉。在此，一种关于服装如何被生产的构建性知识穿透了服装奢侈品的幻觉。同样，虽然我们并不了解另外某种东西的生产过程，但不妨碍我们抱以反思性的怀疑质问价值幻觉。

因此，难道不是拥有构建性知识的人无意或者刻意创造了这些幻觉，以此“剥削”大众吗？大众的选择是双向奔赴，在每一次具体的选择前都有古怪的博弈，无法归咎于某个特定的幻觉。将构建性知识生产转化成某种大众领域的幻觉一事，也很难讲是出于某种确切的动机。

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讨论知识与权力？

我们可以暂时避开这个问题，从一些更简单的问题开始。

首先我需要澄清权力的概念。

在此我将权力分为两种：一种我称之为自然权力，它指人类在任何具体的互动关系中自然生发的权力关系，即使几个小孩一起玩耍，也会很自然地产生各种“头头”“听你的”“争权夺利”“看不顺眼”的关系，这并不受语言文化等限制，只要能够产生互动，就会有这些东西出现。自然权力属于人的本能范畴，只要人具有社会性，就能够领会运用自然权力。

另一种权力我称之为社会权力，它是维持人类社会而构建出来的权力，依赖于已有体系，独立于自然权力，比如“美国总统”“书记”“班长”“审判长”，正是反抗语言经常对抗的那种权力。社会权力也是自在的，并不像任何狭义意识形态声明的那样具有某种天然正当性，它一旦被创立，就不得不被视为脱离了其创立意图的自在之物。

人类所生活的权力关系，永远是两种权力的交织与转化之中。社会权力正是出于对自然权力的某种企图而被创立的。反政府者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自然要以制度化的形式合法化其执政权力；企业创立者走完野蛮生长的初期阶段，自然要以制度化的形式解决各种新问题。无论何种社会权力，也无法完全脱离自然权力的某些“原则”，纯粹倒行逆施，也不可能期待以一个社会权力上头衔的传承完成自然权力的传承，比如经典的继承人问题、政权合法性问题等等。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比较好回答了：知识如何与这两种权力互动？

首先是社会权力。操纵权柄对知识的传播施以影响是毫无疑问能力之内的事，可以强行禁止、切断、焚烧、禁绝，也可以大肆鼓吹、宣传、张扬、复制，可以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也可以曲解附会混淆视听……从技术上分析社会权力如何影响知识传播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这暂时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这也只是一个方面，更复杂的方面暂时不在此赘述。

知识如何影响社会权力也有诸多显而易见的答案。真正的问题是在此如何定义“知识”。当某种反抗思潮不断酝酿兴起，最终颠覆一个政权时，这种“思潮”算是某种“知识”吗？我认为是的。“知识”在此就是某种反思性或构建性的思考，它引发了对于现存秩序的追问和试图重构的努力，当我们问下去，获得了一个新的回答，我们就是获得了一个新的知识，这与具体的内容无关。

因而更深刻的问题在这里：知识如何与自然权力互动？毕竟，一切社会权力最终都源于自然权力。

我们可以回到神话，想想看三皇五帝这些神话性政治人物做了些什么——他们将知识留存下来，形成了某种普遍性惠及大众，也即我们称为生产力进步的东西。人类不同神话谱系中广泛存在着对这类故事的尊崇，意味着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自然权力的“原则”中，创造价值者天然比分配价值者具有更高的尊崇，理想的君王——分配价值者的最终面目，应当同时是创造价值者。

我们也可以从更普遍的情况入手，想象我们如何建立了自然权力——我们被认为可以将一件事完成地更好，因此获得他人的信任与授权，从而自然建立了权力。我们也可能直接面临来自他人的权力挑战，我们在挑战中胜出，从而确认了权力。（比如对立政权的战争，同一件事的竞争对手……）知识正是我们将一件事完成地更好，或者在挑战中胜出所需的东西。尽管知识可能使我们做得更好也可能更坏，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一定是胜出的一方具有更多被证明有效的知识。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就会立刻意识到在最一般的语境上，知识对权力意味着什么。我们称之为帝王学的东西，如果不能在统治者中得到良好的传承，将会对政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称之为狭义意识形态的东西，如果不能在统治阶级中得到良好的传承，将会对统治根基造成灾难性的瓦解。我们称之为国民基础教育的东西，如果不能在国民中得到良好的推广，我们就不能指望国民具有我们所期望的种种素质，或是按当下流行的某种工业化叙事，“没有国民基础教育就没有工业化现代国家可言”。

因此，权力传承的一项基本要求就是知识的传承。在当代家族化的资本生产体系中，“家风”“家学”“言传身教”“口传心授”即是如此。我们永远不可能期待“家学”获得某种面向公众的真正开源性，因为语言，尤其是被刻意记录的语言，永远只是我们所能表达的微末部分。而如果没有知识的开源，追求权力的开源（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民主）也就没有任何合理性的基础可言。在我所知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大概只有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开源生态，才具有这个意义上的开源性。

那么，何以建成一个知识开源的体系，并最终赋予所有人权力开源，就像民主理想所追求的那样？或者更简单地，可能建成这样的体系吗？我对此表示悲观，这并不源于某种哲学上的分析，那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而仅仅是对历史的简单观测。

重要的是，一个知识开源的体系最终也仅仅是权力开源的先决条件而已。自洽的权力开源必然意味着所有人在知识开源上的同等，至少是同层级、可相互理解的。然而，这在根本上是反人性的。集国家之力进行的继承人培养尚且屡屡失败，我们如何期待在少得多的资源场景下完成所谓大众的知识培育？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我们不能在人类对于知识的追求上有什么过高的期待，被证明有效的那些机制，最终都是以结果论英雄的筛选机制。正如我在开篇所说的，我们无法穿透现代社会的层层幻觉并非由于智慧不够，而仅仅因为我们是能力有限的人类而已。我将那些超越人类能力领域的事物称为神学领域，比如追求某种绝然客观、绝然正义、绝然审判、全知或者全能。在此意义上，追求民主，本质上是在追求某个神学领域的东西。

至此，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另一重批判也完成了。我之所以如此坚定地批判共产主义理想，正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最有价值，因而也最值得批判的政治思想。如果生活在当代的人不能完成对其重构，看看我们能留下些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将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重大失败。即使回归最现实的角度，我们也不能回避某种完全背离共产主义理想的当代政治趋势，至少我们要看到发生了什么，问问究竟为何如此。